

中國經濟思想史

下

胡寄窗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 018 1116 5

中國思想史經濟
下

胡寄南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经济思想史

(下)

胡寄窗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3.125 插页 2 字数 511,000

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500

书号 4074·467 定价 (七) 2.70 元

说 明

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现在能与读者见面，以不负十多年来读者同志们对它的期待，应该是一件可喜的事。对著者自己来说，这更是一桩值得庆幸的事。因为这部下册稿于一九六五年秋就已完成，侥幸在十年浩劫期间，寒家虽几次被查抄，此稿幸而漏网，始有今日与读者见面的机缘。倘使此稿真因被抄去而散失，纵使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迎来学术重新繁荣的春天，以著者年近八旬的衰退精力，势难另起炉灶，为学术界偿此夙债。

自本书上、中两册分别在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问世以来，学术界曾对书中的若干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发扬百家争鸣的精神，这是很值得欢迎的。著者自己考虑，在全书的编写过程中，至少在主观上是很谨慎地坚持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方针，对于每一论点的提出均曾经过一番反复推敲并力求举出其经典依据，向不敢草率从事。过去十多年来，除已出版的上、中两册偶尔发现一些技术性的小错误外，全书的编写体系和各种论点似尚无作重要修订的必要。趁此下册旧稿与读者见面的时候，顺便将此点说明一下是有必要的。

胡寄窗

一九八一年七月

目 录

下册 封建地主经济后期的经济思想(十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中叶)	1
第一部分 宋元封建帝国的经济思想	3
第一章 李觏的富民思想	18
一 周礼致太平论与基本经济观点	18
二 平土书中的土地思想	22
三 分配概念	26
四 工商、冗食与贸易观点	29
五 货币与价格	33
六 财政概念	40
第二章 王安石的经济改革	48
一 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意义	48
二 经济行政机构的改革	52
三 均输法与市易法	55
四 青苗法与农田水利措施	61
五 募役法与免行钱	67
六 方田均税法与其他经济措施	73
七 王安石的经济改革所体现的经济思想的总考察	76

第三章 新法反对派的经济思想——司马光、张方平、苏轼兄弟	99
一 新法反对派的基本政治倾向和阶级实质	99
二 坚决攻击新法的司马光	102
三 张方平的经济思想——附秦观	108
四 苏轼兄弟的经济思想	113
第四章 苏洵、张载的井田思想与沈括、周行己的货币思想	129
一 关于周礼的井田思想	129
二 苏洵对井田论的批判及其土地方案	132
三 张载的井田思想	139
四 沈括的货币流通速度论	147
五 周行己的货币思想	154
第五章 叶适的经济思想	164
一 永嘉“功利之学”与叶适	164
二 财富观点	171
三 重本抑末思想的批判	178
四 货币与人口	185
五 财政思想	190
六 其他	195
第六章 林勋、朱熹、董煟的经济思想与南宋的货币思想	205
一 林勋的井田论	205
二 朱熹的经界论与阶级调协论	210
三 董煟的救荒思想	216
四 南宋货币思想	220

第七章 许衡、叶李、卢世荣与其他元初的经济思想	239
一 许衡的经济思想	242
二 叶李的钞币条划	247
三 卢世荣的经济政策	252
四 赵天麟、郑介夫的经济思想	263
第八章 马端临与元末的经济思想	279
一 马端临的经济思想	279
二 虞集的京东垦田议与董挟霄的百里一日运粮术	293
三 王祎的金银铸币论	296
第二部分 明清(鸦片战争以前)封建帝国的经济思想	305
第九章 丘浚的经济思想	326
一 明初的经济问题	326
二 丘浚经济思想的基本倾向	332
三 财富概念	335
四 土地、人口与所谓配丁田法	339
五 货币与利息	345
六 贸易与价格	352
七 财政思想	359
八 结束语	369
第十章 十六世纪反传统观点和传统经济思想的 尖锐对立	381
一 泰州学派代表思想家——王艮、何心隐和李贽的经济观点	382
二 吕坤、东林学派的经济观点	394
三 保守派的经济言论	397
第十一章 明末革命农民的经济纲领,徐光启的农学 及明末其他经济思想	414

一 明末革命农民的经济纲领	415
二 徐光启的农学	418
三 宋应星论高利贷	427
四 明末的货币思想	431
五 明末的经济类书	437
六 李雯的盐政思想	440

第十二章 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的经济思想(上)

——黄宗羲与顾炎武	451
一 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论	452
二 顾炎武的经济思想	461

第十三章 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的经济思想(下)

——王夫之	478
一 王夫之的基本哲学观点	478
二 社会经济的历史发展进化观	481
三 财富概念	486
四 土地思想	493
五 矛盾的贸易观点	502
六 货币与价格	506
七 财政观点	510

第十四章 唐甄与颜、李学派及其主要成员王源的

经济思想	527
一 唐甄的富民思想	527
二 肯定物质经济问题的首要地位的颜、李学派	534
三 颜、李学派对工商的高度重视	538
四 颜、李学派的土地议论，王源的惟农有田论和城市宅地政策	541
五 颜、李学派的财政和货币思想	548

第十五章 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的经济思想	559
一 蓝鼎元的海外贸易论	559
二 洪亮吉的人口论	565
三 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初的货币、价格、贸易观点	578
四 十九世纪初的经济思想——包世臣、吴铤、谢阶树	584
第十六章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前后的货币争议	603
一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货币争议产生的客观经济条件	603
二 王瑬的钱币刍言	607
三 许楣兄弟的反钞币观点	614
四 林则徐的铸造银币论	620
五 兑换纸币论——包世臣与王茂荫	625
六 铸大钱论及其他	637
第十七章 龚自珍与魏源的经济思想	648
一 宣扬“自私”福音的龚自珍	648
二 龚自珍的财富与分配概念	650
三 龚自珍论货币贸易与财政	653
四 龚自珍所谓“农宗”的时代实质	656
五 魏源经济思想的基本特点	660
六 魏源的财富概念及其崇奢论	664
七 魏源关于生产经营的观点	667
八 魏源的贸易思想——对外贸易差额论	671
九 魏源的货币思想	677
十 魏源的财政思想及其他	681
第十八章 鸦片战争以前经济思想的总考察	692
一 西周到鸦片战争前夕经济思想的阶级基础	692
二 重要经济概念的演变	701

下 册

封建地主经济后期的经济思想
(十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中叶)

第一部分

宋元封建帝国的经济思想

中国封建生产方式的地主经济阶段从宋封建帝国起开始转入一个新的发展进程，也就是地主经济体系转入它的“下坡”时代。这个“下坡”运动蜗牛式地前进，缓慢地持续了九百多年。宋承唐末农民革命运动之后，再度出现了地主经济的繁荣，但在这一次繁荣后面却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经济矛盾，与地主经济前期汉唐的繁荣时代所出现的矛盾比较，也起了显著的变化，从各方面都反映出来。

首先，封建社会的两个敌对的基本阶级均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地主阶级方面，中小地主阶层开始占着优势，形成一大股政治力量。“其田多不过百亩，少者至不满百亩”〔1〕的中小地主在全国各地区普遍存在〔2〕。从南宋严州情况看来每一地主平均不过四个左右佃农〔3〕，这也说明中小地主的普遍存在。中小地主阶层人数的众多并不排除豪强地主传统势力的保持。宋代被称为是“不抑兼并”的王朝〔4〕，官品形势之家占田达“天下田畴之半”〔5〕，“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6〕，“一邑之财十五、六入于私家”〔7〕。此外，如官田及土地小私有也是当时土地占有制的组成

部分。中小地主阶层的成长壮大成为一股政治力量是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形式后期的主要特征，它和前期以豪强地主与小私有农民为基本组成部分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别。作为地主阶级来说，豪强地主与中小地主都是同一本质的剥削阶级，后者对农民的剥削并不一定比前者轻松。苏轼就曾指出：“富民之家以三十二亩田，中分其利，役属佃户，有同仆隶”〔8〕。事实上，中小地主的广泛存在，只意味小私有土地者阶层的日益衰落，农民获得自己土地的机会更少，更不得不屈从于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封建生产关系愈来愈成为社会生产力的桎梏。但是代表整个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由于地主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随时出现尖锐的矛盾，就可能在某一时期较多地代表这一阶层的利益而在另一时期又较多地代表那一阶层的利益，还可能依靠一个阶层而抵制另一个阶层〔9〕。在中小地主阶层也提出政治要求的条件下，封建国家就可能多考虑一些他们的利益，特别是在他们基于自己的利益和各种小私有者以及农民暂时结合起来向豪强官僚大地主进行斗争的时候，更可能如此。这个剥削阶级的内部矛盾，在经济思想中的反映是，从宋代起不断出现代表中小地主利益的思想家与代表大地主利益的思想家之间的斗争。由于中小地主阶层是新成长起来而又是未经常取得政治统治地位的力量，他们的代表人与大地主阶层的代言人之间的斗争，常表现为新与旧的斗争或要求改变与坚持保守的斗争。又由于在他们与大地主势力的斗争中，其利益有时和工商业者的利益相一致，甚至偶尔也和农民的利益相一致而暂时地结合起来，因此，他们的代表人的观点在整个封建地主经济后期一般应视为进步思想。当然，如和革命农民的经济思想比较，那又成了保守的甚至是落后的观点。

农民阶级的较多部分成为佃农。由于租佃关系已进一步发展成为支配的劳动组织形式，无论官田或私田大都通过租佃方式给人耕种^[10]，农民除部分自耕的土地小私有者外，不为私人地主的佃户即为国家地主的佃户。宋初李觏曾说：客户（除坊郭客户外）大部分是“佃人之田，居人之地”^[11]；南宋朱熹又说：“乡村小民其间多是无田之家，须就田主讨田耕作”^[12]。当时所谓“庄客”、“浮客”、“牛客”之类均系指佃农而言。中小地主阶层的日益增大与佃农的广泛存在是同一事物的两个对立面。租佃制下的农民一直是封建地主经济后期承受着残酷地租剥削的最基本的群众，也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封建生产关系的主要特征之一。租佃农民的人身依附程度，从形式上看，是较地主经济前期在豪族大地主直接控制下的荫附农民或部曲为减弱^[13]，但把客户看作奴仆，任意“鞭笞驱役”^[14]的大地主仍然不少。可是租佃农民所获得的这一点点人身依附的减轻，也是以更沉重的地租负担为代价换来的。表面上是佃农的劳动果实“主得其半，耕者得其半”^[15]，事实上是要先扣除种籽和赋税以后^[16]再为分配，农民所得已是微乎其微。至于依赖地主高利贷以进行生产或维持生活的佃户^[17]其穷困更不堪言。

在这种更巧妙而沉重的封建剥削方式下，中国农民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封建地主经济后期是和农民革命的这个新的光辉篇页一同开始的。封建前期的无数次农民革命运动不曾提出自己的经济要求。唐末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农民领袖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第一次在农民革命历史上把“平均”^[18]的要求作为一面斗争的旗帜并当作一颗灿烂的宝石嵌上自己的桂冠。王仙芝反映农民“平均”要求还只是对“平均”状况的向往，没有具体的内容。数十年后的诸佑起义便以“使富者贫，贫者富”^[19]

为号召，反映了农民群众憎恶贫富对立的原始平均要求。这种要求是农民“对富人和穷人之间……骄奢淫逸者和饥饿者之间的对立的自发的反映”^[20]。又数十年后，北宋初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提出“均贫富”的口号，宣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21]。此后一系列的农民起义如北宋中叶的张海、郭邈山等散钱帛与贫民，“开官库之物以赈贫穷”^[22]，管三起义强迫大地主“斥其钱粟以予小民”^[23]，北宋末人所共知的宋江以“劫富济贫”为替天行道，方腊资助贫者资财，宣扬平等互助教义^[24]。南宋钟相起义的口号又增添了新的内容，成为“等贵贱，均贫富”，公开否定富贵贫贱之分，“以劫财为均平”^[25]，更加鲜明地体现了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此后农民起而“夺粮”、“劫富”反抗地主者更是司空见惯。前面所提到的这些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不必都是农民出身，但他们均系代表当时农民群众的观点与要求。他们所提出的斗争口号是否在斗争过程中加以贯彻实行，从经济思想角度考察是无关紧要的。均贫富的主张是我们很熟悉的从先秦以来早就出现过的思想。可是，在宋初农民起义军的战斗口号出现以前的所谓“均贫富”，即使是起义农民的代表者提出来的，也只是以温和地劝说富人或借助于封建法权的方式，企图适当地缓和贫富差距悬殊的矛盾。而北宋以来农民群众自己的均贫富观点，则是以暴力革命方式剥夺富人而实现贫富的绝对平均。这是宋初革命农民的均贫富思想与以往代表剥削阶级的思想家的所谓均贫富不同之处，不能因为口号的字面相同而混同其本质的区别。宋以后革命农民的经济思想与秦汉以来的起义农民经济思想也还有阶段性的差别。封建地主经济前期无数次农民起义的矛头，基本上是指向繁苛的赋役和封建统治集团的残酷迫害，因而农民的要求主要是幻想出现某种万年“太

平”的世界。这就是说，只要求有一个不怎样妨碍封建生产力发展的政治上层建筑，使他们在现实的生产关系下面还勉强能生活下去。到了封建地主经济后期，那是连生产关系也日益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具体表现为农民革命的矛头不仅指向封建统治集团的财政压榨和政治迫害，也指向地主阶级的残酷地租剥削。他们从模糊地要求某种“平均”，逐渐发展到要求“均贫富”，再要求“等贵贱”。由于它是一种自发的运动，所以思想观点的发展过程也比较缓慢，从空洞的“平均”口号到“等贵贱均贫富”之间就经过了二百多年的时期。然而唐末宋初的革命农民的战斗纲领与汉末的万年“太平”^[26]思想比较，已是跨了很了不起的一步，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这一时期的农民还未能认识他们所憎恶的贫富不均现象，根本上是由于土地财产的分配不均，也就是根源在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所以，他们只满意于均分一般财富，反而忽视了土地财产这一封建社会的命根子。直到明末才在认识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均分土地的战斗纲领。清嘉庆十七年（公元一八一三年）天理教起义时又提出“日后事成，分地一顷”的更具体的口号。再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的出现，成为我国封建时期革命农民的土地均分思想的最高、最后体现。封建地主经济后期的农民斗争的经济纲领，从而他们的经济思想的演进过程，虽是甚为缓慢，与前期比较却是起了很大的变化，成为本历史时期的一个非常重要而显著的特征。

作为封建社会支柱之一的手工业经济，从两宋开始也起了新的变化。首先是手工业的分工更加细密。民间手工业分工情况无完整的史料可资依据。据马可波罗游记所载，宋元之际的中国手工业比同时期欧洲的著名手工业都市如米兰、威尼斯以及其他意

大利各手工业中心地区的发展程度要高得多^[27]。只以宋代官府手工业而论，关于美术工艺方面的就有四十二作^[28]，土木工程方面的有二十一作^[29]，这还未包括纺织、染色、陶器、冶金等方面分工在内。故民间手工业分工情况也必很有可观。手工业规模的大小难于作平均的估计。只以宋代矿冶为例：徐州利国监是冶铁中心，计有“三十六冶，冶各百余”^[30]，共约五、六千矿工；信州铅山等处的铜、铅矿，“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开采，得铜、铅数千万斤”^[31]；诏州铜、铅、锡、银等矿区，“四方之人，弃农亩，持兵器，慕利而至者不下十万”^[32]。又如汴州军器监有“万全军匠三千七百人，东西作坊工匠五千人”^[33]，共八千七百人。只此数例足见手工业规模的增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自由手工业者中也出现了所谓“富工”，即作坊主人，他们能同“通邑大都之有力者争无穷之侈”^[34]，其富裕程度可以想见。在手工业中出现这个特殊的阶层是极为值得注意的事实，它体现了某种新生产关系的因素的萌芽。因此，从宋代起，传统的“富民”概念就增添了新的内容，亦即在地主阶级之外还包括所谓“富工”在内。这是封建前期所不曾出现的新社会阶层，成为宋以后为“富民”辩护的思想家日益增多的客观基础，因而也就不能笼统地把这种思想看作是单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经济观点。在手工业中的又一重要变化是雇佣关系被较广泛地采用。雇佣劳动在战国后期即已出现，如“卖佣而播耕”^[35]；在唐代虽已渐广泛，但在官府工场中仍以服劳役不给报酬的“番匠”为主，以雇佣的“明资匠”和“巧儿匠”为辅。两宋时的官府工场就倒转来以雇佣的“募匠”为主干，以“鳞差”或称“当行”（即唐代番匠的变形）为辅。而鳞差也是支付工资的，他们和募匠不同之处是：募匠是常雇的定额工匠，鳞差是临时由各路府抽派来服役的各行